



二十世纪全纪录

周丽琼 主编

1945

目 录

中国部分	1
世纪回眸.....	1
抗战的最后胜利	1
重庆谈判	5
人民解放军抢占东北	43
小资料.....	50
世界部分	61
世纪回眸.....	61
印支人民抗法战争	61
俄罗斯著名作家 A·H·托尔斯泰逝世.....	66
缅甸鳄鱼吃人惨案	67
琉黄岛战役	68
阿拉伯国家联盟成立	70
日本东京大轰炸	71
苏联红军攻克柏林	72
战胜国法西斯纪念日	73
瓦伦堡事件	75
古斯特洛夫号空前海难	76
墨索里尼的末日	77
希特勒的末日	79
饱经沧桑的三艘航空母舰	82
广岛“蘑菇云”	86
日落东京湾——日本投降签字仪式	88
冲绳战役	99
小资料.....	138

中国部分

世纪回眸

抗战的最后胜利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临近最后胜利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于4月23日~6月11日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号召解放区抗日武装力量迎接全国大反攻的到来。各解放区抗日武装力量坚决贯彻中共“七大”路线。八路军各部队在华北地区展开了以夺取有利的反攻阵地为主要目标的夏季攻势。晋冀鲁豫区部队（8月20日成立晋冀鲁豫军区）向平汉铁路中段两侧及鲁西、晋南之敌发动进攻，先后举行东平、安阳、阳谷等战役，歼灭日伪军1.3万人。晋察冀军区部队为夺取向北特别是向东北地区发展的前进阵地，在平汉铁路两侧和锦承铁路以南地区连续发起雁北、察南、热辽等战役，歼灭日伪军9000余人。晋绥区部队展开了以夺取忻县至静乐、神池至义井公路为重点的攻势作战，使敌之运输陷于瘫痪。山东军区部队发动以胶济铁路东段为重点的攻势作战，讨伐了一些大股伪军，并进行了蒲（台）滨（县）、临（沂）费（县）、郯（城）码（头）等战役，共歼灭日伪军2.5万余人。新四军在华中地区对敌

守备薄弱的城镇据点展开积极进攻。解放区抗日武装力量在1945年春夏季攻势作战中,共歼灭日伪军16万余人,攻克县城61座,收复国土24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达1000万人。至1945年8月,遍布19个省区的解放区总面积已近100万平方公里,拥有人口1亿多,控制县城100多座,部队发展到93万余人,民兵220余万人,已把日伪军压缩到大中城市、交通要道和沿海一带,为转入全面大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5年春夏之间,日军在正面战场向豫西、鄂北和湘西发动进攻。国民党军进行了抵抗,给日军以大量杀伤。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挫败日军的进攻,与解放区抗日武装力量的攻势作战相呼应,使侵华日军在战略上处于全面被动的局面。另外,1943年10月~1945年3月,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先后有8个军共22个师的兵力,在美、英军配合下,在缅甸北部和中国云南西部举行反攻,歼灭日军4.8万余人,收复了怒江以西国土和缅北的中心城市密支那,打通了滇缅、中印公路。中国远征军为解放东南亚人民作出了贡献,并有力地支持了盟军在亚洲、太平洋战场对日军的战略反攻。

解放区抗日武装力量举行全面反攻,夺取抗战最后胜利 1945年5月8日,德国法西斯战败投降。苏联随即向远东地区增调兵力,准备对日作战。太平洋战场上的盟军步步逼近日本本土。日本大本营为坚持“本土决战”,不得不在中国战场上采取战略收缩,放弃湘桂铁路及粤汉铁路沿线大部地区的守备,将在华南地区的日军主力向华中地区集中,准备转用于上海、山东半岛、朝鲜沿海,及用于确保华北、华中和东北。1945年春,中国战区统帅部为适应军事形势的发展,与盟军协同作战,制定

中国战区的总反攻计划。同时,为便于协同盟军对日军转取攻势,于云南省昆明设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负责西南各战区部队的统一指挥及整训,并将所辖部队编成第1至第4共4个新的方面军,共计28个军86个师及其它特种部队。4月下旬至8月中旬,第2、第3方面军乘侵占广西的日军撤退之际,跟踪追击,收复广西。

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随即出兵中国东北,对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抗日武装力量,将局部反攻作战发展成为全面大反攻。8月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号召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8月10、11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朱德连续发布对日军展开全面反攻及受降等7道命令。各解放区抗日武装立即向日伪军发出通牒,并发起全面反攻。晋察冀军区部队向平绥铁路东段、平汉铁路北段和津浦铁路北段进攻,切断了石德、北宁铁路,解放察哈尔,对北平、天津、石家庄、保定等城市形成包围。晋绥军区部队切断了同蒲铁路北段和汾(阳)离(石)公路,解放绥远和山西北部广大地区,逼近太原、大同等城市。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向道清铁路、平汉铁路中段和同蒲铁路南段进攻,解放邢台、焦作、邯郸等城市,逼近新乡、开封。山东军区部队分五路对胶济铁路和津浦铁路中段展开进攻,切断了津浦铁路,解放烟台、淄博等城市,逼近青岛、济南、徐州。新四军向平汉铁路南段和津浦铁路南段进攻,并北出陇海铁路线,攻克县城近50座,

打通了华中与山东的联系，直逼南京、上海、宁波、信阳、武汉。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向粤汉铁路南段和广九铁路进攻，解放广东和广西部分地区。这期间，挺进东北的部分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和东北抗日联军一起，配合苏军迅速解放了东北全境。

8月10日，日本政府照会美、苏、英、中四国政府，表示愿意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9月2日，日本天皇和政府及日本大本营的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结束，它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

在解放区抗日武装力量举行大反攻，收复失地，逼近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之际，蒋介石竟然接连发布命令，令八路军“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令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令日伪军不得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令国民党军“积极推进”，企图独占抗战胜利果实。由于日伪军拒绝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缴械投降，解放区抗日武装力量的大反攻作战一直持续到1945年底。据不完全统计，自1945年8月9日~12月底，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共歼灭日军1.37万余人、伪军38.5万余人，收复县以上城市250多座，取得了全面反攻的重大胜利。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取得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中国人民在抗战中取得了巨大的战绩，中国军队共毙伤俘日军155万余人（其中解放区抗日武装力量毙伤俘52万余人，国民党军毙伤俘85万余人，东北抗日义勇军等抗日武装毙伤俘17万余人）。解放区抗日武装力量歼灭伪军118万余人。日本战败后，向中国投降的日军共128.3万人。同时，

中国人民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人民群众伤亡 3120 余万人，中国军队伤亡 380 万余人，军民伤亡共 3500 余万人，占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国伤亡人数总和的 1/3 还多。中国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 1000 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 5000 亿美元。海外的爱国侨胞从道义和经济方面，支持了中国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打破了日本“北进”侵苏计划，迟滞了日本“南进”侵略步伐，从而在战略上有力地支持和策应了苏、美、英等盟国作战。中国战场是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战场，中国人民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性力量。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历史贡献。

重庆谈判

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是毛泽东早就预料到并作着准备的。但它来得那样快，却不是毛泽东完全想到了的。整个局势在短时间内发生急转直下的变化，无数新问题一下子涌来，需要迅速地作出决断。其中最重要的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后怎样妥善处理迅速上升的国内矛盾。

毛泽东以惊人的精力，日以继夜地投入工作。为了应付瞬息万变的形势，毛泽东干脆把办公室搬到枣园的小礼堂，一面处理日常事务，一面接见各地来请示工作的负责人和将领。他每天工作都在十多个小时。办公桌是原来的一张乒乓球台子，中间摆着笔墨纸砚，别无它物。毛泽东饿了，就啃几口馅饼或面包充饥。小礼堂周

围放着一圈长条靠背木椅，来自各地的干部坐在那里等候他的指示。

当时的局势是十分复杂的。抗日战争刚一结束，人们还沉浸在胜利欢乐中的时候，中国上空却已笼罩着一片阴云：一直在保存实力、坐待胜利、准备内战的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动手争夺抗战胜利的果实，把刀锋指向中国共产党。

在八月十日日本乞降消息传出的当晚，朱德总司令已在延安总部向各解放区抗日部队发布向日伪军加紧进攻的命令，要求他们向附近的敌军送出通牒，限他们在一定时间内缴出全部武器；如果日伪军队拒绝投降缴械，应该立即予以消灭，接收他们所占的城镇和交通要道。十一日，延安总部又连续发布六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向敌伪所占地区和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包括要求冀热辽解放区等部队向东北进军，迫使日伪军投降。

同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明确地指出：“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在此情况下，我党任务分为两阶段：甲、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存犹豫。”“乙、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决定。”

那时候，华北和华中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都处在八

路军和新四军包围中，在东北也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一小部分抗日武装在活动；国民党军队的主力退缩在中国的西南和西北地区。这是国民党当局长期奉行消极避战以保存实力政策的结果。蒋介石明白，他的军队难以很快开到日本占领的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受降。当延安总部发布向敌占区大举进军的命令后，他在十一日发出两个相互矛盾的命令：一个要求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推进，勿稍松懈”；另一个发给第十八集团军的，却说：“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他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就是要把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手脚捆起来，让国民党独吞抗日胜利的果实，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回到抗战胜利前的老样子去。人们从这里已经可以感觉到一股令人焦虑的内战的浓烈气息了。

八月十三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论，提醒全国人民：“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同一天，他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指出：“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今后我们还要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着人民来制止内战。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他用斩钉截铁的语言说：“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同时，他也指出：“公开的全面的内战会不会爆发？这决定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因

素。国内的因素主要是我们的力量和觉悟程度。会不会因为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经过我们的奋斗，使内战限制在局部的范围，或者使全面内战拖延时间爆发呢？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中国共产党力争的就是实现这种可能性。

事情正如毛泽东所判断的那样：蒋介石打内战的决心已经定了，但他要放手发动全面内战还有许多困难。在国内，全国人民刚经过八年的抗日战争，普遍反对在战后再发生内战，要求实现国内和平，以便在和平环境中重建家园。在国际上，美英苏等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也都不赞成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而对蒋介石说来，更大的困难在于他的精锐主力仍远在西南、西北地区，运送这些部队到内战前线需要时间。对于这一点，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回忆录中明白地作了说明：当时“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军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事实上，蒋介石甚至连任何再占领华南都有极大的困难。要拿到华北，他就必须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如果他不同共产党人及俄国人达成协议，他就休想进入东北。”

于是，蒋介石在八月十四日、二十日、二十三日连续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速到重庆“共定大计”。蒋介石并不是真的想通过谈判来实现国内和平。他的如意算盘是想利用这一着来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如果毛泽东拒绝到重庆来，就给共产党安上拒绝谈判、蓄意内战的罪名，把战争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使自己在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蒋介石估计毛泽东是不敢冒险来重庆的）；如果毛泽东来了，就给共产党几个内阁职位，迫使共产党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这样，他最后仍可

以消灭已变成赤手空拳的共产党。另一个是，可以用谈判来取得准备全面内战、特别是调兵遣将所必需的时间。

在接到蒋介石的第一、第二次电报后，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天就要出发到前线去的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陈赓、薄一波、萧劲光等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一开始就指出：“现在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他分析道：进入这种情况时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是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我们曾力争进入若干大城市，现在没有成功。原因有二：一是苏联受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二是蒋介石利用他得到盟国承认的合法地位，使日军完全向他投降。我们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蒋介石的地位，既有有利方面，也有不利方面。他的不利方面是：在他面前摆着强大的解放区，解放区的抗日功劳无法磨灭，也无法封锁；国民党内部有矛盾，又不能满足人民的民主民生要求。毛泽东着重提出一个问题：“和平能否取得，内战能否避免？”他说：我们现在的新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和平是能够取得的，因为英美苏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摊子没有摆好，兵力分散）。他同时也指出：“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蒋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因为上面所说的那些原因，需要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等待机会消灭我们。所以斗争是长期的，迂回曲折的。从中国的局面来看，成立的联合政府“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占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还要钻进

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根据这个方针，毛泽东建议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一个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他判断：在谈判中，关于承认解放区和解放军的争论一定是非常激烈的，可能要打打停停，甚至可能要打痛他才能逼他让步，总之他是不会满足我们的。毛泽东说：对国民党的批评，本来是决定停一下的，因为日本突然投降，蒋下令要我们“驻防待命”，不得不再批评一下，今后要逐渐缓和下来。以后仍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团结，有理有利有节。不可能设想，在蒋的高压下没有斗争可以取得地位。他建议：“恩来同志马上就去谈判，谈两天就回来，我和赫尔利就去。这回不能拖，应该去，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参加这次会议的萧劲光回忆道：毛泽东“对我们这些即将奔赴前线的同志说，同志们担心我去谈判的安全。蒋介石这个人我们是了解的。你们在前方打得好，我就安全一些，打得不好，我就危险一些。你们打了胜仗，我谈判就容易些，否则就困难一些。他风趣地说，目前的情况是有三种果子，我们可能得一批小的，失一批大的，另外，还要力争一批不大不小的”。

会上，周恩来、陈云、朱德、张闻天、彭真、彭德怀等先后发了言。毛泽东最后说：大家的意见很好。今天的方针是七大定下来的，七大的方针就是反对内战的方针。当前内战的威胁是存在着的，但国民党有很大困难，至少今年不会有内战。所以和平是可能的，必需

的。他又说：“我是否出去？我们今天还是决定出去而不是不出去。但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我出去，决定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我和恩来出去后，书记处还有五人开会。”就在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一天，蒋介石的第三封邀请电到了。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驻重庆的代表王若飞回到延安。毛泽东等七个政治局委员连夜同王若飞磋商。二十六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发展，对他去重庆谈判的问题，明确地表示：“可以去，必须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他说：“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涉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出去谈判会不会造成“城下之盟”的局势？毛泽东说：“签字之手在我。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他设想了可以作出让步的限度：第一步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步是江南；第三步是江北；但“陇海路以北迄外蒙古一定要我们占优势”。如果这样还不行，“那么城下就不盟，准备坐板房。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何鸣危险外，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所以决不怕。”

为了统一党内的思想，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未宥”电（即《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已收入《毛泽东选集》），并在当天向各中央局和各大战略区发出。电报中指出：

“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国民党在取得沪宁等

地、接通海洋和收缴敌械、收编伪军之后，较之过去加强了它的地位，但是仍然百孔千疮，内部矛盾甚多，困难甚大。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假如此种局面出现之后，我党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加紧国民党区域城市、农村、军队三大工作（均是我之弱点）。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解放军的数量，并不许发纸币，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

“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同时我党力量强大，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但是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项原则，必须坚持，不可忘记。”

毛泽东起草的这个党内通知，把中共中央力争实现国内和平局面的态度说得很清楚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时三十七分，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从延安飞抵重庆。

这是一个万众瞩目的时刻。到机场迎接的有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有邵力子、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黄炎培、郭沫若等。飞机在九龙坡机场徐徐降落。《大公报》记者子冈作了这样的报道：

“人们不少有接飞机的经验，然而谁也能说出昨天九龙坡飞机场迎接毛泽东是一种新的体验，没有口号，没有鲜花，没有仪仗队，几百个爱好民主自由的人士却都知道这是维系中国目前及未来历史和人民幸福的一个喜讯。”

“第一个出现在飞机门口的是周恩来，他的在渝朋友们鼓起掌来。他还是穿那一套蓝的布制服，到毛泽东、赫尔利、张治中一齐出现的时候，掌声与欢笑声齐作，延安来了九个人。

毛泽东先生，五十二岁，灰色通草帽，灰蓝色的中山服，蓄发，似乎与惯常见的肖像相似，衣服宽大得很。

这个在九年前经过四川境的人，今天踏到了抗战首都的土地了。”

毛泽东在机场向记者发表书面谈话：“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

这天晚上，他们出席蒋介石在山洞住处举行的欢迎宴会，并且留住在山洞林园。第二天，同蒋介石进行第一次商谈，并确定双方的谈判代表：中共方面是周恩来和王若飞，政府方面是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三十日晨，毛泽东、周恩来从山洞林园进城，分别拜会了宋庆龄、张澜和赫尔利等，然后住入红岩八路军办事处。九月一日，毛泽东出席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的有宋

庆龄、孙科、冯玉祥、陈诚、陈立夫、沈钧儒、马寅初、郭沫若、茅盾等三百多人参加的鸡尾酒会。毛泽东来到重庆，在社会上激起了巨大的反响。《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读者胡其瑞等四人的来信说：“毛泽东先生应蒋主席的邀请，毅然来渝，使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诬词和误解，完全粉碎了。毛先生来渝，证明了中共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这的确反映和代表了我們老百姓的要求。”毛泽东在重庆的四十三天，除刚到和临行时有三天住在林园外，其他时间都住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二楼，同周恩来、王若飞住在一起。红岩村地处郊区，对来客很不方便。因此，张治中把自己的寓所上清寺桂园让出来，给毛泽东作为在城里会客、工作、休息的地方。毛泽东每天上午从红岩来，下午在桂园会客和工作，晚上仍回红岩。

“每天晚上，毛泽东从桂园回来后，首先要和周恩来、王若飞、胡乔木一起研究当天谈判的情况，揣摩国民党代表的心理，把握谈判的动态，制订出有关的政策。

他们研究得很深很细，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常常研究到深夜。”“研究完谈判之事后，周恩来回到自己的屋子里，起草电报或文稿，安排毛泽东第二天的活动，处理一些要事。毛泽东则在自己的房间里思考下步的工作。”“待忙完这些事后，毛泽东要通览全天的各大小报纸，不仅要看《新华日报》，还要看国民党办的各家报纸。一般的报道，他通览一遍放下。重要的文章和报道，他要认真反复地看，通过报纸，了解各界人士对谈判的反映，掌握时局的发展。”

重庆谈判是一场复杂而艰苦的斗争。

由于国民党对这次谈判并没有诚意，也没有估计到

毛泽东真会这样快地应邀来到重庆，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准备好谈判方案，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方面先提出意见。

九月二日，毛泽东约王世杰到桂园商谈，周恩来、王若飞也在座。毛泽东对这次谈判提出了八点原则性意见：一、在国共两党谈判有结果时，应召开有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二、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如国民党坚持旧代表有效，中共将不能与国民党成立协议；三、应给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所享有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予以废止或修正；四、应予各党派以合法地位；五、应释放一切政治犯，并列入共同声明中；六、应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内的民选政权；七、中共军队须改编为四十八个师，并在北平成立行营和政治委员会，由中共将领主持，负责指挥鲁、苏、冀、察、热、绥等地方之军队；八、中共应参加分区受降。

第二天，周恩来、王若飞将中共方面拟定的两党谈判方案十一项交给国民党代表转送蒋介石。王若飞在谈判结束后向政治局汇报时说：“前六天，看他们毫无准备。左舜生刻薄他们，说只见中共意见，不见政府意见。”九月二日晚、四日、十二日、十七日和十月九日、十日，毛泽东或者单独，或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或在赫尔利参加下，同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会谈。

当时担任毛泽东副官的蒋泽民回忆道：“毛泽东到重庆后，每次参加谈判，我和陈龙都跟随前往，毛泽东他们在里屋商谈，我们在外屋等候。无论谈判多么紧张，斗争多么尖锐，争执多么激烈，毛泽东的表情是平静的，举止是从容的，讲话时的语调也都是温和的。”“在外屋等候的我们，有时也能隐隐约约听见里面的争吵声。我